

堅持武裝鬥爭

一、革命風潮鼓蕩全國

從義和團運動失敗到辛亥革命爆發的十年中，中國人民反對清朝反動統治的鬥爭洶湧澎湃，發展很快。參加反抗鬥爭的群眾非常廣泛，農民、工人、手工業者、市民和商人等都越來越多地加入了鬥爭行列。

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所以能得到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而迅速發展，是因為有了新的社會階級基礎。這個新的社會階級基礎就是資產階級。在前面論述興中會成立時曾提到，中國的民族工業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就已經開始產生，隨著民族工業的產生，新興的資產階級也開始出現。到了二十世紀初，由於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使得民族資本主義工業隨之也有了相應的發展。這個繼續發展的趨勢，到了一九〇五年以後，就更加明顯了。據不完全统计，一八九五至一九〇四年的十年間，全國新設廠礦為一百六十八家，而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一年間的六年間，新設廠礦就有三百二十二家；雖然它們主要是輕工業（如棉紡織、麵粉、繅絲、火柴等部門）和小型企業（如煤礦），但由此而促進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增長，卻是一個明顯

的事實。這個新興的階級，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切身感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束縛，迫切要求經濟發展上得到政治保障，因此，對於改革政治、奪取政權的鬥爭就特別關心。華僑資產階級中有很多人出身小商人甚至工人，同國內封建統治階級聯繫較少；同時由於他們接觸了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又受到外國人的歧視，痛恨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有較高的革命情緒。孫中山所建立的興中會，華僑占會員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八，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八是華僑資產階級。孫中山進行革命活動和在沿海各地從事武裝起義，都是靠華僑在經濟上給予支援的。這個時期，各省蓬勃開展的反對帝國主義控制中國的鐵路、礦產資源和傾銷洋貨的運動，也是在這一條件下發生的。資產階級積極參加和領導了這個鬥爭。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間，京漢、津浦、蘇杭甬等鐵路線所經各省，先後提出收回自辦的要求；湖北、湖南、廣東三省要求從美帝國主義手裡奪回粵漢鐵路，各省群起響應。一九〇四年冬和一九〇五年春夏間，由於反對美帝國主義迫害華工、要求廢止中美華工條約，以上海工商界為主的中國資產階級，又發起了大規模的抵制美貨運動，波及十多個省的大中小城鎮。反美愛國運動在全國展開，給美帝國主義以有力的打擊。

但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在國內外反動統治階級面前，力量畢竟是弱小的。並且，這個階級是具有兩面性的階級，一方面，由於它是半殖民地國家中的資產階級，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所以，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官僚軍閥政府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它是半殖民地國家中的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異

常軟弱的，所以又保持著對於革命敵人的妥協性。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意同帝國主義完全決裂，並且他們同農村中封建地主階級的地租剝削有密切聯繫，因此，他們就不願和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不願和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所以，反對反動統治的主要力量是農民和其他廣大勞動群眾。

農民一直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主力軍。這一時期，以農民為主體的勞動群眾，踏著義和團勇士們的血跡，威武不屈地繼續向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發起勇猛的進攻。抗捐、抗稅和反對外國教會的鬥爭，在各省、縣此伏彼起，連綿不斷，幾乎遍及全國。其中規模較大的是一九〇四年七月江西樂平人民反對抽收「靛捐」的鬥爭。種靛農民和會黨群眾聯合起來，在夏廷義的率領下沖入縣城，奪取槍支，焚毀縣衙門，搗毀鹽卡、厘卡、統捐局和洋教堂，狠打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並且連續幾天英勇地抗擊了清朝政府調來鎮壓的反動軍隊。這次鬥爭堅持了半年之久，嚴重地打擊了清朝統治者和外國侵略者。與此同時，大小規模的武裝起義，也接二連三，層出不窮。例如，直隸（河北）人民在廣宗縣聯莊會首領景廷賓領導下，於一九〇二年以「掃清滅洋」為號召，掀起了冀、魯、豫平原二十四州縣的二十萬農民大起義。他們向清朝政府的貪官污吏和帝國主義教會、教士進攻，包圍了威縣、廣宗、冀州、南宮、棗強、隆平、寧晉、柏鄉等縣，革命聲威大震，反動派聞風喪膽。規模更大的是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五年廣西全省幾十州縣人民的武裝鬥爭。這次起義，最盛時有漢、壯、苗、瑤等族數十萬群眾參加起義軍，他們把清朝政府在廣西的統治者打得焦頭爛額，毫無辦法，最後不

得不向「洋主人」法帝國主義「乞援」，因此，引起了全國輿論的憤怒聲討，使帝國主義者也不敢妄動。孫中山從這次農民起義中受到很大鼓舞，他當時就滿懷信心地指出：「滿清軍隊在任何戰場上都不足與我們匹敵，目前愛國分子在廣西的起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¹¹⁵

在這一時期，中國工人階級還沒有作為一個覺醒的、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舞臺，但在逐步發展中，已和農民階級一起成為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重要力量。一八九七年在上海「租界」裡，五千名小車工人為抗捐舉行罷工，並以棍棒、扁擔、磚瓦、石頭作武器，和鎮壓他們的巡捕進行鬥爭。一九〇三年，雲南個舊錫廠工人為反抗法國侵略者修築滇越鐵路、侵佔錫廠舉行起義。他們提出「抗官仇洋」的口號，很快就攻佔石屏、臨安等地，發展到一萬多人。一九〇五年，漢口銅貨工人三千多人，為反對資本家克扣工資進行罷工。在反帝反封建的戰線上，這支新興的社會力量，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

還有，城鎮手工業者和中小商人，多年以來被繁重苛刻的攤派所困擾，不能維持正常的營業，在全國許多地方也不斷掀起抗捐罷市的鬥爭。

這些群眾性自發的反抗鬥爭和武裝起義，席捲全國，聲勢浩大，震撼著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有力地推動了革命形勢的飛速發展。孫中山受到了國內這些勞動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有力推動，從廣西會黨起義的烽火中，看到了美麗祖國「新紀元的曙光」；從各處蓬勃發

展的群眾鬥爭中，他得出了「中國現今正處在一次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的正確結論。孫中山認為，清朝統治已經像一座破房子，整個結構從根本上徹底地腐朽了，只要抽掉一根木頭，或者挖去一塊牆腳，就會整個倒塌下來。他莊嚴宣告：「全國革命的時機，現已成熟。」在大變動即將到來的時刻，「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燒遍全國，就能推翻清朝統治者。¹¹⁶因此，他在和改良派進行論戰的同時，更積極地籌劃武裝革命鬥爭。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都擁有龐大的反革命武裝，人民大眾要挽救祖國的危亡，只有拿起武器，採用武裝革命的形式。孫中山作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最先進的一點，是他在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氾濫之時，就揭舉武裝起義的旗幟。此後他一直把武裝鬥爭放在重要地位，始終堅持武裝起義的正確道路。正如他一九〇三年在一封信中所說的，自己「向來專心致志於興師一事」¹¹⁷，要用武裝起義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統治。在同盟會成立之後，孫中山在兩條戰線上領導著資產階級革命的鬥爭。即一方面領導了與改良派的論戰，如前面之所述；另一方面就是指揮革命黨人積極開展武裝鬥爭。當時，他除了派遣一部分同盟會會員秘密回國，為準備武裝鬥爭集結力量外，他本人也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武裝起義的種種籌備工作。他往來於日本、南洋、歐美各地，除了建立革命組織、宣傳革命道理以外，還聯絡會黨，籌措款項，目的都是為了組織起義。如果說，從孫中山組

116 《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六十一—六十四頁。

117 《覆黃宗仰望在滬同志遠作掃除保皇黨聲援函》（（一九〇三年）），《國父全集》第三冊，臺灣一九七三年版，第三十一頁。

織興中會起，就進行了幾次反清的武裝起義，那麼到了同盟會時期，和興中會時期相比較，是「更充滿了武裝起義的事蹟」。他在一九〇七—一九一一年的四年中，領導革命黨人連續不斷地組織了八次武裝起義。

二、萍、瀏、醴起義

同盟會成立一個多月，孫中山於一九〇五年十月七日就離開日本前往越南、新加坡等地，發展同盟會組織，並籌畫在中國的華南地區發動武裝起義。

一九〇六年十月，孫中山回到日本東京，和黃興、章太炎等同盟會領導人一起，制定了《中華民國軍政府的〈革命方略〉》，它由十一篇檔組成（一九〇八年又增加二篇），包括《軍政府宣言》、革命軍和地方政權的建制、各項軍政佈告和《對外宣言》等，專供各地革命黨人發動起義時動員群眾、鼓舞士氣、瓦解敵軍和指導對外關係之用，從而再次體現了孫中山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的一貫思想，和顯示了他的巨大決心。

當時，孫中山在東京的生活十分儉樸。據在其身邊的同盟會員回憶說：「他的生活和一般的平民一樣，屋內的陳設，除了書籍和必須的用具以外，並無其他物。孫先生的服裝很樸素、清潔。」有些青年同盟會員到他那裡去，孫中山見他們穿的衣服帶灰塵或是鞋襪髒了，就親自替他們刷衣擦鞋。有親身感受的梁瑞堂回憶說：「這件事使我很受感動，至今還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像孫先生這樣一位當時已經著名的革命領袖，對於我當時還不到二十歲的一個

青年，如此親切關懷，我和當時追隨孫中山先生的許許多多同志一樣，覺得他不僅是一位可尊敬的革命領袖和導師，而且又是一位和藹可親的父兄。」

這一時期，革命取得了迅猛的發展，正如孫中山所概括的：「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余之希望，則為之開一新紀元。……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佈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之主義，而傳佈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料者矣。當時外國政府之對中國革命黨亦多刮目相看。」

一九〇六年春，長江流域洪水成災，米價大漲，不少地區處於饑餓狀態。東京同盟會總部派劉道一、蔡紹南回湖南運動軍隊，重整會黨，做起義的準備。他們回到長江後，決定劉道一留駐長江，負責和總部聯繫，蔡紹南則前往江西萍鄉一帶聯絡會黨。

蔡紹南到達目的地後，得到同盟會員、明德學堂學生魏宗銓的幫助，很快和萍鄉、瀏陽、醴陵一帶的洪江會首領龔春台等取得了聯繫。

在湘贛哥老會和他們的共同策動下，十二月四日，萍、瀏、醴起義（史稱「萍醴之役」，又稱「萍瀏醴起義」）全面爆發。貧苦農民、會黨群眾、萍鄉安源礦工和部分防營兵勇參加了起義。起義軍定名為中華民國軍南軍革命先鋒隊，龔春台為都督，蔡紹南為左衛都統領兼文案司，魏宗銓為右衛都統領兼錢庫都糧司，廖淑保為前營統帶，沈益古為後營統帶。在所發佈的《中華民國軍起義檄文》中，列舉了清政府的「十大罪狀」，憤怒揭露清廷對外投降賣

國、對內殘酷壓榨人民的滔天罪行，宣佈革命宗旨是「破除數千年之專制政體」，「建立共和國」，並「使地權與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會」。並聲言：未來社會的「幸福」，「不但在韃虜宇下者所未夢見，即歐美現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¹¹⁸這一檄文表達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全部綱領，使起義具有和舊式農民起義截然不同的新色彩。從檄文的主張中，可以明顯看出同盟會員在這次起義中的影響。洪江會的義旗一舉，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群眾如潮水般湧來，發展很快，十天之內，隊伍就擴大到三萬多人，一度控制了四五個縣，震動了長江中、下游各省。當起義消息傳到東京時，在同盟會中引起了很大反響，會員們紛紛要求回國參加戰鬥，孫中山也認為「機不可失」，他和黃興立即派同盟會員寧調元、楊卓霖、胡瑛、孫毓筠等人，先後趕回國內，分赴蘇、皖、湘、鄂、贛、粵各省組織起義，以聲援萍、瀏、醴起義。但各地起義還未發動，萍、瀏、醴起義已在五萬多清軍的圍攻下，英勇奮戰二十多天，終以孤立無援，於是月下旬遭到鎮壓。

起義失敗後，清軍大舉「清鄉」，搜捕革命群眾，一直進行了三個月。十二月下旬，同盟會員劉道一和會黨領袖馮乃古等人被捕就義。一九〇七年三月七日，魏宗銓也被捕殺。總計，起義軍前後遇難者一萬餘人，群眾被殺害者兩萬餘人。

對於萍、瀏、醴之役的失敗和劉道一的死，孫中山極為沉痛，稱此為「同盟會員之第一次

流血」。特作七律詩志哀。詩云：「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此去霸圖空。尚餘遺孽艱難甚，惟與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風悲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攬江流一奠公。」¹¹⁹

在萍醴之役發生後不久，日本的個別報紙刊文誹謗孫中山是「叛徒」，革命黨人聞後非常氣憤，並把這一情況告訴孫中山。孫中山微笑說：「常人毀譽無足輕重，吾黨行事，一本義理，義理所在，雖毀何傷！我們革命目標既定，務使達到而後已，天下後世，自有定評。」

當時，在廣西壯族流傳的歌謠中，是這樣概述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的：

多虧孫文宣導革命，

四處奔走救國救民。

他勸告老少齊參加，

恢復中華打倒滿清。

聲勢浩大的萍、瀏、醴起義，表現了廣大人民的革命積極性，農民、工人及其他勞動群眾對清朝統治的仇恨已經達到了一觸即燃的程度。他們歡迎先進的政治勢力的領導，少數同盟會員的活動給起義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這次起義爆發於中國腹心地區，雖然失敗了，但其規

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革命派的士氣也大受鼓舞。它告訴人們：如果革命黨人集中力量在國內活動，深入到勞動群眾中去，宣傳革命綱領，施行正確的策略，反清武裝起義的怒火並不難遍及全國。

三、起義起義再起義

（一）潮州黃岡之役

萍、瀏、醴起義失敗後，清政府瞭解到同盟會是萍、瀏、醴起義的策動者，便要求日本政府驅逐孫中山出境。一九〇七年三月四日，孫中山被迫離開日本經新加坡赴越南。他於三月十四日到達河內後，立即在甘必達街六十一號設立了領導西南武裝起義的總機關，準備就近籌畫廣東、廣西和雲南三省的起義。他所以要選擇兩廣和雲南作為起義地點，是由於這些省份地處邊境，群眾基礎好，易於發動；地域寬廣，便於迂回作戰；而且從國外輸送武器和人員也比較方便，「容易得到海外的接濟」。他計畫先奪廣東，次取廣西、雲南，然後就可佔領南部七省。長江流域和華北平原各省也會紛紛起回應。這樣便能實現奪取全中國的革命目標。

在孫中山偕胡漢民、汪精衛、胡毅生、黎仲實等在河內設立起義的總機關時，窘於軍款不足，他又想起在法國輪船上相遇的張靜江。他先後兩次給張發電，第一次寫的「A」字，第二次寫的「E」字。不久收到張靜江匯來的一萬法郎和五萬法郎。之後，孫中山命胡漢民致函感謝，並詳述軍事用款計畫。張靜江回電說：「我深信你必用於革命，所以願盡力助你成

此大業，你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實無報告事實之必要。若被敵人所知，於革命進行有所不利。你能努力猛進，即勝於作長信。」信中充滿對孫中山的信賴和崇敬之情。

黃岡是廣東潮州府饒平縣的一個大鎮，地處嶺東，市況繁榮，為閩、粵省交通要道。

當地三合會勢力很盛，其重要頭目為許雪秋。

許雪秋（一八七五—一九二二年），為一華僑富商，喜擊劍舞拳，與江湖會黨有聯繫，有「小孟嘗」之稱。一九〇三年受到福建人黃乃裳的影響，立志革命。一九〇六年六月孫中山在新加坡時，吸收其加入了同盟會，並任命他為中華民國軍東軍都督，主持嶺東一帶軍務，積極聯絡會黨，準備在潮州起義。同年冬，在日本又派廖仲愷、喬義生、方漢成、方瑞麟、李思唐、張煊、方次石、鄧慕韓、謝良牧、還有日本會員萱野長知、池亨吉先後前往協助。途經新加坡時，又選派了黃耀廷、鄧子瑜、余紹卿等到廣東惠州東江一帶準備配合許雪秋並舉。



一九〇七年三月，孫中山派許雪秋負責籌畫潮州黃岡起義。圖為孫中山在新加坡晚晴園與黃岡起義籌備人員合影。左起：孫中山、張永福、萱野長知、陳湧波、林時埭、湯壽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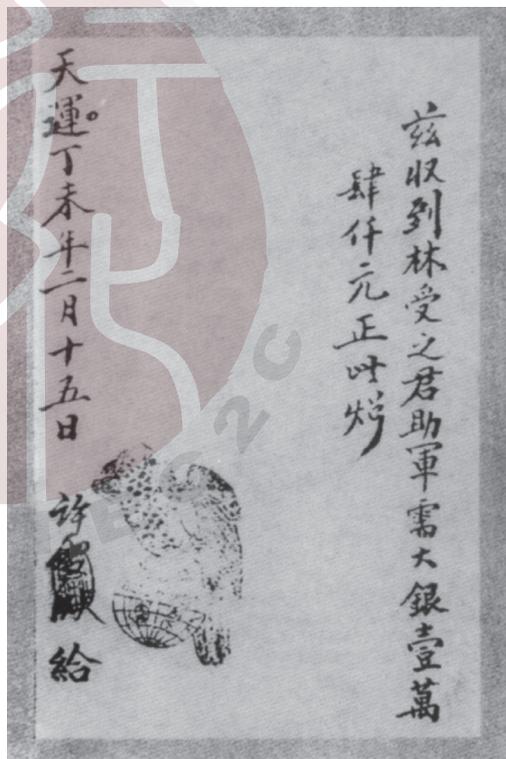
許雪秋在他的家鄉宏安，召集了一次軍事會議，決定在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九日（正月初七）乘清軍春節疏於防務，分頭大舉。派喬義生、李思唐、張煊、郭公接赴饒平縣的浮山墟部署，計畫至期夜襲潮州府，由黃偉齋率潮州城內十八館黨人為內應。余丑、余通、方漢成、方次石赴黃岡；黃德勝等赴惠來；羅飛雁等赴揭陽；謝良牧、李次溫、李於偉等人計畫埋伏於潮汕車站、蔡家祠、敵山台、潮安內城各處；陳芸生、蕭竹荷擔任運動揭陽清炮臺兵反正。一切安排均已就緒，但至期因風雨大作，浮山黨人時聚時散，黃岡一部也無法集合。許雪秋見時機已過，令各部暫行分散，候命進取。不料風聲已被洩露，敵人四處搜捕黨人，薛金福、黃志、張順數人被捕遇害。許雪秋委派陳宏生進行安置。他與謝良牧、方瑞麟等到香港同盟會分部彙報並請示，馮自由向河內發電向孫中山報告，孫中山電示：「此後起事時期須與惠州及欽廉義師，約定同舉，以便



黃岡起義軍起義誓師的情景。

牽制清軍，令雪秋萬勿孟浪從事，致傷元氣。」

許、謝、方等寓居香港闌桂坊等候惠州方面的消息。喬義生、池亨吉駐汕頭幸阪旅館傳遞情況。到了五月下旬，余丑、陳湧波來香港報告：黃岡同志又被清吏捕去二人，同志擬克日舉義營救，許雪秋等聽了也躍躍欲動。香港分部再三勸阻，讓他們「靜候總理命令，務與惠州、欽廉同時發動」。令余丑、陳湧波二人回黃岡設法制止。潮州總兵黃金福，接黃岡都司隆啟報告說黃岡確有革命黨聚眾情形，即派守備蔡河宗帶兵防範，並捕捉黨人兩名。余丑、陳湧波主張非速舉事不能營救同志，遂聚眾七百人，在六月二十一日晚九點，圍攻黃岡協署，血戰一天，城內各衙署皆為革命軍佔領，擒都司隆啟。革命軍僅亡二人，傷十餘人。起義軍順利地佔領黃岡後，成立了軍政府，推舉陳湧波、余丑為正副司令，同時以「廣東國民軍大都督孫」等名義發佈檄文，宣佈「各行店，照常交易，免除一切苛捐雜稅」。



南洋華僑支持黃岡起義的捐款收據。

二十四日夜，余丑、陳湧波又率兵向黃金福大本營汧洲港進攻，激戰兩天，因清軍援兵四集，革命黨腹背受敵，加上械劣彈乏，孤立失援，隊伍宣佈解散。這時，許雪秋、喬宜齋、萱野長知正在汕頭幸阪旅館，策劃豐順、揭陽、惠陽、潮安各縣回應。這時，清提督李准統兵到汕頭，

許雪秋還想轟擊敵人兵船，因戒備嚴密，無從下手。於是，許雪秋又回香港，發電河內，向孫中山報告經過。之後，許雪秋到河內向孫中山說明起義失敗原因：「土炮不敵洋炮，為黃岡一役失敗之主因。倘能從外國購運新式軍械至惠州汕尾洋面，可預雇大員船在海上接收，即在海豐、陸豐沿岸招集黨人大舉發難。」孫中山表示同意，派萱野回日本購買軍械，命許雪秋等回香港繼續策劃。

十月七日，萱野來電：「械已購妥，村田式快槍二千支，短槍三千支，日本古刀五十具，將校用刀二十具，民黨領袖犬養毅贈古刀三具以壯聲勢。」香港分會派鄧慕韓、陳二九到日本協助萱野啟運。許雪秋、劉思永、譚劍英赴汕尾準備接迎。八日，



惠州黃岡起義秘密機關——黃岡挑水巷泰興雜貨店。

萱野、鄧慕韓、陳二九乘「幸運丸」自日本長崎起航，於十二日船抵汕尾。但當船到岸時，未見帆船接應。三小時後，才見許雪秋駕一小舟，前來探視，萱野急命速備大船卸械。這期間由於許雪秋在汕尾、捷勝沿岸屢聚黨人，風聲四起，及械船駛近海岸時，圍觀群眾竟聚一萬多人。清碣石鎮總兵吳祥達嚴加戒備，派小兵輪不斷遊弋偵察。萱野要把船駛往外海晚間再來，但船主因船中還運有三井洋行煤炭，定要駛赴香港。等許雪秋租用帆船出海時，貨船已經駛去。鄧慕韓、陳二九、萱野到《中國日報》社同盟會支部找馮自由、胡漢民商量補救辦法。議決該輪三日後煤炭卸竣，再由萱野率黨人五百人乘原船赴惠州海豐洋面，將軍械交該地同志，就在平海舉事。這期間，香港當局得到廣東督署照會要求扣留「幸運丸」。日本領事為免生交涉，令該船迅速回日本，近萬元的軍械由此化為泡影。海豐、陸豐起義計畫落空。孫中山於二十六日在河內向萱野寫了長信進行慰勉：「閣下之任務，以能使軍械運至目的地，即為完全無闕，而許氏乃遇事倉遑，偵候不明，不知有兵艦，預備不周，不能雇備大船，報告不實，以至雖已運送到目的地之軍械，而仍不得其用……而絕無所疑閣下之行事者也……以後所倚托於閣下之事正多，願閣下更為鼎力賜助是幸。」

這次潮州黃岡起義，在清軍大舉進攻下，堅持戰鬥了五天，因糧械短缺而失敗。二十七日，陳湧波、余既成等「為保存實力，以圖再舉」，解散起義軍。餘等由海道潛赴香港。

（二）惠州七女湖之役

五月底，孫中山派在惠州地區策劃起義的同盟會員鄧子瑜等，聽說黃岡之役已發動，並

不知道黃岡之役已經失敗，帶領一部分會黨武裝於六月七日在歸善（今惠陽）縣七女湖回應。

鄧子瑜是惠州歸善人，在香港、新加坡經營旅館業，與內地會黨聲息相通。孫中山派他協助黃耀廷在惠州等地的軍務，負起惠州起義全責。五月，因潮州軍事緊迫，他派陳純、林旺、孫穩等到惠州歸善、博羅、龍門分三路起事，結果只有歸善一路有所發動。六月二日，在歸善縣的七女湖舉義，劫奪了敵軍防營，繳槍多支，擊斃巡勇及水軍巡艦哨弁多人。五日，進攻泰尾，清守兵望風而逃，又連占楊樹、三達、柏塘、八子嶺、公莊等地。義旗一舉，各鄉會黨和群眾紛至沓來歡迎，紛紛前來參加，聲威大震。

其時，由於惠州府陳兆棠急電廣州督署營務處求救，粵督周馥即調駐惠州東路巡防各營管帶洪兆麟、李聲振、吳鼇等部，又增調新會右營守備、中路巡防第十營管帶鐘子才援助。革命軍只有二百余人橫行於水口、橫瀝、三經、蔗浦等處。雙方混戰十多天，多次擊敗清軍，敵人死傷甚多。革命軍出入於山村路岔之中，使清兵疲於奔命。但終因寡不敵眾，加以缺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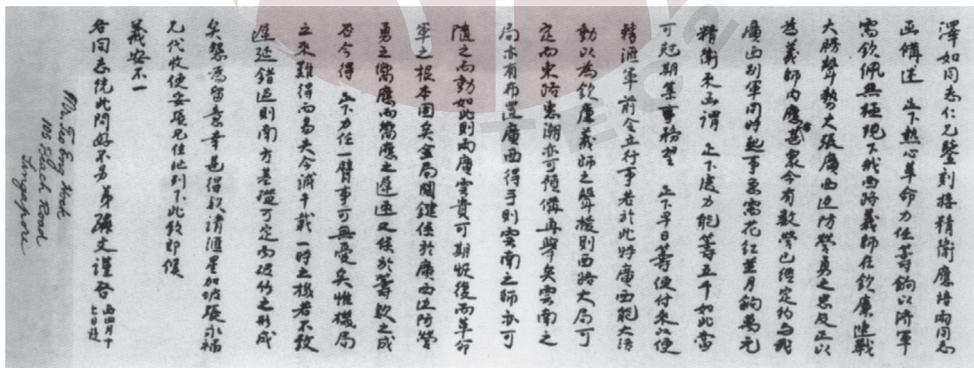


一九〇七年六月，孫中山發動了惠州七女湖起義。圖為起義直接指揮者鄧子瑜。

彈藥，起義隊伍迫不得已於六月十九日將武器埋在地下後自行解散。

(三) 欽州、廉州、防城之役

一九〇七年春，廣東的欽州、廉州（今均屬廣西壯族自治區）兩地人民因反抗當地官府強行糖捐制度而發生暴動，官軍開槍打死數十人，激起民憤，集結日眾。粵督周馥派統領郭人漳率防軍二營，標統趙伯先（趙聲）率新軍步隊一營前往鎮壓。孫中山派鄺敬川到廉州良屋與抗捐鄉團首領劉思裕、黃世欽、唐甫珠接洽，曉以革命大義，並說明抗捐義舉應與革命黨一致行動，進行有計劃、有組織的起義，不但可免受清軍的攻擊，還可完成光復中華的大業，劉思裕等欣然贊同。因清軍統領郭人漳、標統趙伯先素與革命黨有聯繫，孫中山遂派胡毅生到北海趙伯先營處約同郭、趙乘機舉義，又派陳油持書給胡毅生令其轉告郭、趙：「欽、廉團兵已與黨人聯，勿相殺！」但陳油到北海時，郭、趙所部已開走，陳油未能追趕將信送到，故郭人漳不知內情，到了欽州米村，向鄉團攻擊，劉思裕等以為



一九〇七年四月，孫中山指示鄧澤如為即將發動的欽州、廉州、防城起義籌款函。

革命黨已與郭人漳聯繫，未加防備，死傷甚眾，劉思裕被害。胡毅生到河內時才知道這是由於陳油未能將信送到造成的失誤，導致自相殘殺。

孫中山命王和順（一八六九—一九三四年，字德馨，號壽山，壯族，廣西邕寧人，原是提督劉永福部哨官，後參加反清會黨，曾在南寧梧州起義，一九〇六年冬在西貢參加同盟會）為中華民國軍南軍提督，主持欽、廉軍務。派黃興和王和順隨胡毅生到北海與郭人漳、趙伯先兩人聯絡。郭、趙二人表示：「若有堂堂正正革命軍起，必反戈相應。」黃興隨郭人漳營在欽州，胡毅生隨趙伯先營在廉州，王和順在各鄉鎮深入鄉團聯絡，準備一致行動。孫中山素知欽、廉人民驍勇善戰，決定派日本會員萱野長知攜款回日本購買軍械，準備大舉。

欽州、廉州起義前夕，欽州鄉團有六、七千人，革命軍二千人，準備反正的郭人漳、趙伯先所率新軍有六千人，只待萱野所購武器一到，先占防城，再取東興沿海一帶作為革命根據地。東興位於中國與越南交界處，僅一河之隔，橋南就是越南的芒街。當時的計畫是：「武器一到，則我黨可成立正式軍隊二千餘人，然後集合欽州各鄉團勇六、七千人，而後約合郭人漳、趙伯先二人所帶之新軍約六千餘人，便可組成一聲勢浩大之軍隊。再加以訓練，當成精銳，則兩廣盡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後出長江以合南京、武昌新軍，則破竹之勢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但「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畫為之破壞」。

王和順於九月四日率領革命軍攻防城。五日，清軍駐防城衡守營連長左營哨官劉輝廷、右營哨官李耀堂先後反正回應，革命軍很快佔領了防城，殺了縣官朱鼎元等。隨後留鄺敬川

率少數隊伍駐守防城，即移師攻襲欽州府城及靈山等地。天將亮到達距欽州還有四十里的湧口。中午，黃興、郭人漳率衛隊六十人出城來迎。郭人漳表示：「欽城不必戰，晚來便得。」劉輝廷以郭言不足信，與王和順商量，「宜將所部，改換郭之軍服，疾進欽城東門，留郭與大隊隨後掩至，而佔領之，乃上策之上」。王和順以「黃興與郭深交，且在郭部多時，尚無危險，不宜以不肖待人」，又縱郭人漳回欽州。革命軍九月六日早四點從湧口出發，將近欽州，郭人漳派黨人郭時安來說：「欽廉道王瑚及駐欽宋安樞部，已戒備，所部不能發動，請黨軍勿來起義。」等郭時安回城時，郭人漳勃然變色，指郭時安通敵，為了滅口將其殺掉。原來，郭人漳昨日出城，見湧口黨軍勢弱，以為很難成事，不便與起義軍為伍。起義軍探悉郭人漳已無意反正，王和順率起義軍改道攻靈山，與清軍激戰，三日未克。他們先後發佈了《告粵省同胞書》、《告海外同胞書》及《招降滿洲將士佈告》三種起義文告，申明「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根本，掃專制不平之政治，建民主立憲之政體，行土地國有之



一九〇七年九月，孫中山發動了欽州、廉州、防城起義。圖為起義直接指揮者王和順。

制度，使四萬萬人無一不得其所」。號召廣東省同胞「共矢忠貞，以圖大業」，¹²⁰發展到三千多人。

孫中山得知佔領防城後，立即從河內派人四出募款購械，準備接濟。當時起義軍並沒有和當地農民的武裝——抗捐隊伍相結合，形成孤軍作戰的局面；加上清朝新軍統領郭人漳一面稱「贊成革命」，一面又派兵襲陷防城，使起義軍腹背受敵。儘管如此，起義軍一直堅持到九月中旬，由於槍械彈和軍需給養均發生困難，最後被退入粵、桂兩省交界的十萬大山中。

（四）鎮南關之役

欽州、防城之役後，孫中山又和黃興計畫從越南襲取要塞鎮南關（今友誼關），進攻廣西。鎮南關介於中國、越南兩國之間，為廣西遊勇活動的地方。孫中山為配合防城起義軍進取西南，過去曾派革命黨人往遊勇中宣傳革命思想，爭取他們參加反清鬥爭，並取得了一些成果。九月，他又委派王和順為鎮南關都督，前往桂邊那模村，同早與革命有聯繫的憑祥土司李佑卿聯繫，議定了攻取鎮南關的計畫。但李佑卿所部遊勇不服從綠林出身的王和順調動。王和順無奈，不得已折返河內。

稍後，孫中山又改命游勇首領黃明堂為都督，以李佑卿為副都督，繼續籌畫起義。

黃明堂（一八七〇—一九三八年），廣東欽州人，壯族。他因憤於清政府腐敗，投身會黨，

曾聚遊勇數百人，呼嘯山林，多次擊敗清軍，其名不脛而走。自受命於孫中山後，進行順利，迅速與鎮南關炮臺守兵聯絡成熟了。

這次名震中外的鎮南關起義，孫中山、黃興、胡漢民更是直接投入了戰鬥。

十二月二日，黎明前的黑暗時刻，黃明堂和另一游勇首領關仁甫迎著刺骨的山風，率領廣西那模村遊勇八十多人，攜帶快槍四十二支，由鎮南關背面小路摸索著前進，向鎮南關炮臺迂回偷襲。他們攀登斷澗危崖，直趨第三炮臺，正在睡夢中的一百多名清兵，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就成了俘虜。

游勇一鼓作氣，加上內應守軍配合，清軍猝不及防，紛紛投降，相繼又奪取了第二炮臺。起義軍佔領了鎮南、鎮中、鎮北三座山巔炮臺。

陰霾的雲霧終於被驅散了，淡淡的陽光從一條隙縫中照耀著高山，山下的清兵遠遠望見青天白日的旗幟在山頂上迎風飄揚，才知道鎮南關最險要的三座炮臺，已經落入革命軍手中。

十二月三日上午六時，孫中山、黃興、胡漢民、胡毅生、池亨吉和法國退職炮兵上尉狄氏一行十人，即從河內搭火車北上，趕來參戰。

孫中山自從離開日本到了河內，清政府便懸賞白銀二十萬兩索取他的腦袋，或以雲南省作為報酬要求法國政府逮捕、引渡孫中山。這樣，在過去的二百多天裡，孫中山一直幽居隱所，足不出戶。今日，他對能親臨戰場殺敵，深感歡欣。雖然這裡山高林密，荊棘叢生，攀登時相當吃力，他依然興高采烈地巡視起義軍佔領的炮臺，並和起義軍戰士一一握手交談。

孫中山在陣地上，時而開槍射擊敵人，時而蹲在戰士身旁，鼓勵戰士奮力作戰，時而又跑去給戰士遞送槍彈，或者親自動手發炮。他非常感慨地說：「我反對清政府二十餘年，今日得親手發炮轟擊清軍耳！」¹²¹當時，還有一座炮臺仍在敵人手裡，清兵向起義軍開槍放炮，起義軍的陣地上一時槍彈呼嘯，硝煙瀰漫，震天動地。突然，一顆炮彈打斷了一位炮兵手指。站在這位戰士身旁的孫中山，連忙替傷患包紮傷口。

同時，孫中山又訪問了炮臺附近壯族聚居的弄堯村，向當地農民宣傳革命，非常和藹地對他們說：「炮臺現在是我們的了，大家可以上去玩玩。我們不久一定能夠推翻滿清，那時大家就可以自由自在，不受壓迫欺負了。」¹²²

這次戰役，起義軍很快控制了鎮南關，獲得大小炮十四門，步槍四百多支。他們以寡敵眾，和幾千敵人進行晝夜血戰，打死清兵幾百人。後來，因清軍大批增援部隊繼續開到，而起義軍不僅人數少，彈藥也缺乏，實難長久支持。孫中山等審察形勢，便決定下山，返回越南辦理接濟和增援事宜。

正當孫中山在河內洽談借兵和準備購置軍械時，起義軍卻在幾天後經過浴血奮戰失利，被迫於九日撤離鎮南關，退往越南境內燕子大山去了。

1 2 1 《胡漢民自傳》，《革命文獻》第三輯，臺灣一九五五年版，第三百九十五頁。

1 2 2 鄭惠琪等口述：《鎮南關起義見聞》，《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三輯，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第四百三十五頁。

（五）欽州、廉州、上思之役

孫中山「於離河內之際，一面令黃興籌備再入欽、廉，以圖集合該地同志；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以圖進取雲南，以為根據之地」。他認為欽、廉會黨勇氣可用，決定命黃興為總司令，統領鎮南關及十萬大山餘眾，再次在欽、廉地區發動起義，並命黃明堂等規劃進取雲南河口。因而，又有同年三月的欽州馬篤山起義。

黃興奉命後，在河內購得法商盒子炮百數十支，由馮自由在香港購買子彈，並函約欽州統領郭人漳接濟彈藥相機回應。黃興率黎仲實、梁少庭、梁建葵、劉梅卿、李文光等及越南華僑同盟會員二百多人，於三月二十七日開向欽州，隊伍過東興附近的大路村，四處張貼「中華民國軍南路軍」總司令黃興告示，鄉民燃爆竹歡迎。

革命軍於三月二十九日至小峰，清軍管帶楊某率六百名清兵抵禦，革命軍從山上田壟間，突然出擊，打得敵軍四處逃竄。四月初，革命軍在馬篤山一戰獲得大捷，以後轉戰欽州、廉州、上思一帶。隊伍擴大到六百餘人，轉戰四十餘日，後因彈盡援絕失利。郭人漳因部下多次接濟彈藥時，誤受革命軍攻擊，對革命軍頓生惡感，不再接濟，反懷敵意，當革命軍準備向廣州宣化縣進發時，



一九〇八年三月，孫中山發動欽州、廉州、上思起義。圖為起義直接指揮者黃興。

因彈藥不濟，不能再戰，只好令隊伍分途解散，潛入十萬大山，黃興、黎仲實等先後回到河內。

此次起義，黃興率數百人轉戰一個多月，所向皆捷，屢敗清軍，但隊伍始終未能再擴大，是一支游離於人民群眾之外的孤軍。最後，因彈盡援絕，不得不率隊退回越南。

（六）河口之役

河口地處中越邊界，有滇越鐵路經過，北可達昆明，清政府在此地建有炮臺四座，重兵防守。孫中山的機關部設在河內，計畫在雲南發動起義，河口是必爭之地。

雲南河口起義的準備工作是與廣西鎮南關同時進行的。一九〇八年四月，孫中山任黃明堂主持軍事，由王和順和關仁甫協助。

四月二十九日夜二點，黃明堂、王和順、關仁甫率百餘人襲取河口，清軍防營一隊全體士兵四百人反正，合併起來約五百人，向城裡發起進攻，發動了雲南河口起義。

起義軍在當天凌晨四點，佔領河口城，城內警兵也相繼反正。清防務處督辦官王玉帆率兩營人據半山的炮臺死守，並派人密赴老街向法國防營統領求援。法軍統領答覆：「此次起事，乃革命黨，並非盜賊，不能如命。」革命軍奮力攻山，清軍有的投降，有的反戈助戰。河口四座炮臺都被革命軍佔領，得槍千餘支，子彈二十萬發。他們以中華民國軍南軍都督黃明堂名義發出安民佈告，「居民悅服，遠近歸附者絡繹不絕，數日內增加至千餘人，聲勢大振」。革命軍又分兵出擊，先後佔領南溪、新街等地。

孫中山在新加坡聞訊後，即電委黃興為雲南國民軍總司令前往指揮。五月七日早，黃興乘

車到老街赴前敵督師，計畫沿鐵路督軍進攻昆明。他到了河口後，見士兵疲憊不堪，又於十一日返回河內，計畫召集欽、廉黨軍二百人赴河口參加戰鬥。因為阻於投誠清軍不聽調度和對黃明堂、王和順等又指揮失靈，被迫又折回河內。

雲南總督錫良見革命軍聲勢日盛，大為恐慌。調臨安道增厚、開廣鎮總兵白金桂督兵南下救援，並電奏清廷告急。清政府從各省調集重兵進行圍攻，法國殖民當局又禁阻起義人員和武器、糧食，從越南增援雲南，使起義軍陷入困境。他們堅持戰鬥了近一個月，終於失敗。最後，黃明堂率領六百多名起義戰士突圍撤入越南境內，被法國當局解除武裝，強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至此，孫中山在中國西南部親自領導的六次起義都失敗了。

自從一九〇七年五月至一九〇八年四月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孫中山接連在兩廣和雲南三省所發動的這六次起義，並沒有從根本上威脅到清政府的生存，也沒有在更大的範圍內擴大革命的政治影響，



一九〇八年三月，孫中山在新加坡建立同盟會南洋支部，圖為該部辦事處。

卻使部分革命黨人因革命的連續失敗而產生了沮喪情緒，加深了他們對孫中山領導的懷疑和不滿，成為了同盟會上層渙散和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不過，孫中山依然是敗而不餒，一如既往，繼續領導著革命派勇往直前地進行武裝鬥爭。

四、廣州新軍之役

通過西南六次起義之後，孫中山等總結經驗教訓。他認識到過去偏重會黨、戰鬥力不強的不當，便轉而側重於新軍的策反工作，準備繼續組織反清武裝起義。

同盟會在廣州新軍中的活動，一九〇八年時已逐步展開，同盟會員倪映典（一八八五—一九一〇年），字炳章，安徽合肥人，岳王會會員，與熊成基先後同學於安徽武備學堂和江南炮兵速成學堂，後任新軍第九鎮炮兵隊官。一九〇八年倪映典在安徽任炮兵管帶，曾與熊成基計畫在安慶運動軍隊起義，旋因避端方拘捕，南下廣州，任新軍炮兵排長。當時，廣州新軍中有一種演說歷史故事的集會，名為「講古仔」。倪映典就利用這一形式講述岳飛、韓世忠、滿清入關、揚州十日等史事。倪映典刻苦耐勞而又長於鼓動，「言至憤際，拍案幾爛」。同時，朱執信也常隻身潛入新軍串聯。他背後拖著一條大辮子，穿著父親遺留下來的服裝，寬袍大袖，招搖過市，無人懷疑其為革命黨。他便以此為掩護，通過張鰲村、姚雨平等在廣東陸軍中學、小學、講武堂等處發展了不少同盟會員。到一九〇九年春，廣東新軍步、炮、工、輜各營次第建立，成為一支可觀的軍事力量。趙聲、朱執信、倪映典等決計以運動新軍為第一步，在廣州發動起義。

一九〇九年五月，孫中山離開南洋赴歐洲籌募起義資金，將南洋黨務委託給胡漢民，將軍事策劃委託給黃興。其後，胡漢民赴港，囑鄒魯等在廣州界中策動起事。同年夏，倪映典、朱執信等在白雲山能仁寺集會，舉定幹事員，分頭運動，並於天官里寄園五號設立機關，專門聯絡新軍弁目。由於各方面的積極努力，經過幾個月的工作，廣州新軍加入同盟會人數已達三千餘人。

十月，同盟會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以胡漢民為支部長，倪映典為運動新軍總主任。同時派姚雨平、張醜村運動廣州附近的巡防營，朱執信、胡毅生運動番禺、南海、順德一帶的會黨。一九〇九年一月，倪映典到香港向南方支部報告，新軍起義條件已經成熟，要求定於夏曆正月十五元宵節前後發難。南方支部電告遠在美國的孫中山，要求籌匯兩萬元應急，同時電邀黃興、譚人鳳、趙聲等來港主持。不久，孫中山覆電，表示款可籌足，並囑進行勿餒。黃興、趙聲等亦相繼抵港。當時，孫武亦來港。孫表示，湖北已有共進會，如廣東起義，

潘天先生是下久未通問夢想為勢也極克
強心來書注是下近况窮困非常然而發誓更
欲頭是下是下反迎頭痛擊乎之先兄謂此下
為血性男子固窮不濫廉節可風要弟作書
慰謝弟輩知此種行為固是是下天性無足
為異然在下若他人國事堅貞自操歎書備
嘗此語人自問慚愧何如弟以此事空之同人
人皆為威激奮勵則此在下天性流露之微
已有造於吾人多矣弟安能已於言俾謝即
自與在下權別之後事復為端革命軍第
於防城南關河口上舉皆未能一逞目的無
非財力之不逮布區之未週故自河口以後
已不再為難矣面元弟方圖再獲刀自
勇長帝后之後者人心為之一變無不躍
於此有不可於日之勢惟過吾人財力極之不
能乘而起保為可惜
弟且得政名向來信之經濟計畫有模可圖
問弟何時可到改洲商議其事此言想非欺
我弟本欲早日就道苦以旅費無著難以成
行到已四回港羅日間或望有一路得手倘
弟歐洲之經濟計畫可通則其他問題可以
迎刃而解而吾人窮苦一生之願力亦有日能
酬矣此想在下所樂聞弟故預為苦慰
此致即候 大安弟孫文謹啟 二月二日

一九〇九年三月二日，孫中山致函宮崎寅藏，告知幾次起義失敗及計畫赴歐尋求支持諸事。

湖北一定回應。此後，同盟會員、香港商人李海雲捐獻存款兩萬元，經費問題順利解決。

正在弦滿待發之際，一標三營隊官羅嗣廣查獲士兵參加同盟會的證書，粵督袁樹勳下令於二月八日將協司令部及各標、營子彈十五萬發暗運入城。次日，又發生了意外事件。

二月九日為夏曆除夕，下午五時，二標士兵吳英元等因取訂刻的名戳，與城隍廟繡文齋書店發生爭執。員警出面干涉，於是發生互毆。員警逮捕士兵一人，另一人逃回報訊。新軍百數十人持械入城，包圍巡警一局，索回被捕士兵。當日夜，倪映典急至香港報告。黃興、趙聲、胡漢民等計議終宵，決定提前至二月十五日（正月初六）起義。

次日春節，二標士兵數百人又執械入城，遇警兵即打，搗毀警局數處。袁樹勳聞變，下令彈壓。同日，協統張哲培等率憲兵到二標。一面召集士兵訓話；一面命令隊官卸去槍機，連同子彈一起運入城內。並傳令各標，初二不准放假，初三閱操。同日夜，倪映典趕回廣州，見到一發而不可收的局面，決定起事。二月十一日（初二）晨，一標士兵得悉不准放假，全體大嘩，奪門而出。後又傳言憲兵攻營，紛紛闖入軍械房，取械出防。下午，新軍學兵營管帶黃士龍在入城時被守城旗兵射傷，新軍更為憤激。倪映典、譚瀛、黃洪昆等乘機鼓動士兵爭往協司令部、講武堂及各營奪取槍械子彈。倪映典並表示：「此等機會，雖有錢亦買不來」，「只管放心放手做事，香港即時就有接濟。」十二日（初三）晨，倪映典進入炮、工、輜營，全軍歡呼。八時，管帶齊汝漢演說，要士兵勿受誘惑。倪映典連擊三槍，齊汝漢倒地。另一隊長也被倪映典擊斃。其他兩個隊長驚懼自殺。於是，倪映典宣佈起義，被推為總司令，率

領起義軍一千多人經沙河進攻東門。經過一年多的沉寂後，廣州新軍起義爆發了。

同日晨，李准、吳宗禹率防營兩千余人向起義軍進攻，在牛王廟一帶佈防。倪映典身穿藍袍，手持紅旗，馳驅往來。進至橫枝岡，被吳部管帶李景濂以磋商反正條件為名誘入營中。李景濂為同盟會員，倪映典不疑有他，在出營時被亂槍擊中。倪映典犧牲後，起義軍勇猛前進，激戰一時許，犧牲百餘人。因子彈年前即已被繳，起義時每人只分得七粒，迅速打光，不得已向燕塘退卻。當夜，一標步營起火。起義軍以聲東擊西之法向吳軍直撲，但被擊敗。

二月十三日（初四），新軍退守白雲山一帶，清軍四出搜剿，起義軍被俘百餘人。另百餘人在鄉民掩護下，逃亡香港。

當新軍起事時，城內宜安里等機關曾縱火回應，旋被撲滅。附城大塘、樂從各鄉會黨原擬同時發動，因事起倉促，新軍已敗，只得暫停進行。

在廣州新軍起義失敗時，孫中山正在美國舊金山。一九一〇年二月，他在該地華僑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認為滿清政府已成「破屋漏舟」，「不可救藥」，號召人們克服畏難心理，「速立志以實行革命」。¹²³同年三月，為了解決財政困難，他在洛杉磯（Los Angeles）曾與美人荷馬李和布思舉行多次會談，制訂了武裝起義計畫，委任布思為中國同盟會駐國外全權職務代辦，通過布思向紐約財團洽商貸款三百五十萬美元（此項貸款後未實現），以組織軍

隊，訓練軍官，充實革命實力。

與此同時，孫中山連續發電報和長信給在香港的黃興，提出在廣東再次發動起義的計畫。不久，當在香港的革命黨人接讀電報時，「靡不歡躍之至」¹²⁴。之後，孫中山又到了檀香山各埠發表演說，鼓吹再次起義。到五月末，孫中山離開檀香山，準備東返，就近領導國內的武裝起義。在六月中旬行經日本時，曾化裝秘密潛往東京，會見黃興、趙聲和各省在東京的部分革命黨人，商議設立秘密機關，統一各省革命團體的行動。¹²⁵後

來，迫於日本政府不准停留，便於二十五日離開東京經香港前往南洋。

孫中山抵達庇能（即檳榔嶼、檳城，在馬來西亞北部）之後，先後致函南洋各地革命黨人，認為「機局大有可為，不可不乘時圖大舉」，並囑告各地黨人努力募集十萬元作為經費。¹²⁶同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在紐約主持紐約同盟分會成立大會。會議選舉周植生為會長。

124 《黃克強先生上總理書》，一九三三年影印版。

125 《致檀香山同志書》，載黃季陸編《總理全集》下冊，「函札」，成都近芬書屋一九四四年版，第一百二十四頁。

126 鄧澤如編：《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上海正中書局一九四八年版，第七十六—七十七頁。

時，又函約黃興、胡漢民等到南洋來，「以商捲土重來之計畫」。¹²⁷

新軍起義失敗後，一些革命黨人產生了悲觀失望情緒，「舉目前途，眾有憂色」，有的憂鬱成疾，有的急躁衝動，企圖用暗殺方式和敵人拼個死活。孫中山於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英國海峽殖民地（今馬來西亞）庇能（即檳榔嶼）特為召集同盟會的重要骨幹和國內外的代表，舉行秘密會議，鼓舞大家的鬥志，部署下一次武裝起義。黃興、趙聲、胡漢民及庇能、怡保、芙蓉和國內東南各省代表出席。

孫中山在會前和會議中，針對一些革命黨人因西南多次起義——特別廣州新軍起義失敗而情緒低落，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的情況，豪邁地表示「一敗何足餒」，他指出過去屢遭失敗，「幾為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而當前「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畫、無勇氣耳」！他激勵大家「鼓其勇氣，乘此良機，重謀大舉」，並表示：「如果眾志不衰，則財用一層，吾當力任設法。」¹²⁸強調只要做「充分的籌備」，革命一定會勝利的。會議經過充分的討論，打消了一些革命黨人的顧慮，統一了思想之後，決定仍從海外華僑中募集鉅款，集中全黨人力，在廣州舉行一次更大規模的起義。

會後，孫中山以通信方式運動各地同盟會組織及個人募捐經費，派趙聲往香港聯絡廣州新軍，黃興、胡漢民、鄧澤如等分赴南洋各埠募款，還派人到各資本主義國家中購買武器，

127 《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百八十一頁。

128 《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百八十頁。

積極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

同月中旬，孫中山又召集了檳榔嶼的同盟會員和愛國僑胞開會，動員大家為革命捐款。他在會上發表演說，堅決表示要「盡傾吾黨人材、物力以赴之」，「無論如何險阻，破釜沉舟，成敗利鈍，實在此一舉」。號召大家「踴躍輸將」，以盡「救國之責任」。¹²⁹即席認捐了八千餘元。不料，會後有人將他的演說內容向南洋英國殖民當局告密，英殖民當局便以「妨礙地方治安」為名，勒令孫中山出境。

自萍、瀏、醴之役以來，孫中山不但在國內無法立足，在國外也沒有安身之處。不僅檳榔嶼各處禁止他停留，其他各地帝國主義或殖民當局也都禁止他入境，凡是鄰近中國的地方，如日本、越南、南洋等地均不許他居留，正像孫中山自己所說的那樣：「東亞大陸之廣，南洋島嶼之多，竟無一寸為余立足之地」。¹³⁰迫不得已，孫中山只好委託黃興去香港成立機關，主持廣州起義的籌備工作；而他本人則於十二月六日離開庇能，再度遠涉重洋，前往美洲。

一九一一年春天，孫中山不辭勞苦地奔走於美國紐約、舊金山和加拿大的溫哥華等地，向華僑宣傳革命，積極募集款項。僅是這年三月份，在加拿大各埠就籌集了軍餉達港幣七萬多元，占募捐總數的一半，居各地華僑為廣州起義捐款的第一位。

129 楊權翔自述：《紀總理庚戌在檳城關於籌畫廣州舉義之演說》，《建國月刊》第三卷第一期。

130 《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百八十一頁。